

德国战败赔偿 政策研究

(1939—1949)

兼与日本赔偿政策的比较

田小惠 ◎著

战败赔偿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有学者甚至认为“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分歧是导致盟国在所有关于德国占领问题上无法达成永久性一致意见的主要原因”。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德国战败赔偿 政策研究

(1939—1949)

兼与日本赔偿政策的比较

田小惠 ◎著

战败赔偿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有学者甚至认为“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分歧是导致盟国在所有关于德国占领问题上无法达成永久性一致意见的主要原因”。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战败赔偿政策研究：1939—1949：兼与日本赔偿政策的
比较 / 田小惠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117-1482-4

I . ①德…

II . ①田…

III . ①战争赔偿 - 对外政策 - 研究 - 德国

②战争赔偿 - 对外政策 - 研究 - 日本

IV . ① D851.63 ② D83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5702 号

德国战败赔偿政策研究：1939—1949：兼与日本赔偿政策的比较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邢艳琦

责任编辑 邓 彤

责任印制 尹 琪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 (总编室) (010)52612352 (编辑室)

(010)66161011 (团购部) (010)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66130345 (发行部) (010)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5.25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
信息中心资助**

目 录

导 论	1
一、国外研究状况	2
二、国内研究状况	8
三、本书写作思路及基本观点	13
第一章 德国战败赔偿的法律基础及历史回顾	16
一、战败赔偿的法律基础	16
二、一战后德国赔款问题的历史回顾及经验教训	28
1. 一战后德国赔款问题的“怪圈”	28
2. 一战后德国赔款问题的经验及教训	37
第二章 奠定基调：雅尔塔会议前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政府内讨论	41
一、美国：多边主义主导下的争论	42
1. 多边主义原则与对德政治经济问题的讨论	42
2. 德国战败赔偿计划的演进及内部争论	51
二、英国：关注经济安全	60
1. 内阁关于战后肢解德国、对苏政策及其经济安全的考虑	60
2. 德国赔偿政策：麦尔金报告的提出及其影响	67
三、苏联：兼顾政治经济双重目标	77
1. 苏联对战后世界的构想及其与美英关系的考虑	78

2. 苏联的对德政策	82
3. 德国战败赔偿政策：服从于经济重建的需要	85
四、摩根索计划与德国赔偿问题	91
1. 摩根索计划引发的内部争论及其对美国赔偿政策的影响	92
2. 英苏对摩根索计划的反应	97
第三章 合作与斗争：从雅尔塔到波茨坦会议上的德国赔偿问题	102
一、雅尔塔会议与德国赔偿问题	102
1. 麦斯基的八条赔偿计划及莫洛托夫的赔偿提案	103
2. 英苏关于赔偿数额的争论	107
3. 雅尔塔会议后三大国对德国赔偿问题的反应	110
二、莫斯科赔偿会议	112
1. 美英苏参加莫斯科赔偿会议的目的	113
2. 美英之间的龃龉与东西方之间的斗争	115
三、波茨坦会议：赔偿原则的确立	119
1. 会前三大国的利益分析	120
2. 与德国东部边界、欧洲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德国赔偿 问题	123
3. 经济问题分委会关于赔偿问题的初步讨论	126
4. “分区赔偿原则”的提出及评析	128
5. 德国赔偿协议的内容及分析	132
第四章 分道扬镳：工业水平计划与赔偿政策的执行	135
一、工业水平计划的制定及主要内容	135
1. 德国赔偿问题的机构转变与工业水平委员会的设立	136
2. 美英苏三国的报告	138
3. 工业水平计划的主要内容及影响	141

二、英美修改工业水平计划：缩减赔偿、复兴德国	143
1. 贝文报告与英国对工业水平计划的修改	143
2. 美国对德政策的转变与工业水平计划的修改	146
三、美英苏赔偿政策的执行及赔偿数额的估算	156
1. 西占区内赔偿计划的执行及赔偿的估算	158
2. 东占区的大范围拆迁政策	162
3. 马歇尔计划与德国战败赔偿问题	176
第五章 德国战败赔偿政策的比较分析	181
一、德国战败赔偿政策的综合分析	181
二、德、日战败赔偿政策的比较分析	185
1. 日本战败赔偿政策的制定	185
2. 美国与德、日战败赔偿政策的制定	206
3. 德、日在赔偿问题上的政策差异	211
主要参考文献	227
后记	234

导 论

在 2006 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 12 集大型电视记录片《大国崛起》中，对德国有句评论：“这是一个奇妙的国家，他要么拷问世界，要么拷打世界；当他用思想来拷问世界时，它是伟大的；当他用战争来拷打世界时，便有了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确，回首历史，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到成为冷战对峙的核心地带，应该可以说，德国是对整个 20 世纪国际关系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随着 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东西两德在历经 40 多年的分裂后重新实现了统一。然而，时至今日，东西方不同意识形态在两德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主导，造成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裂痕难以迅速弥合。如何深刻理解这一现实问题是促使笔者研究本课题的基本动因。德国的分裂是冷战的产物，而在 1949 年以两德正式成立作为标志性事件出现之前，东西占领区已经在经济政策上实现分立，美、英与苏联在赔偿问题上的分歧则是导致这一分立的重要原因。

战败赔偿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一战后的德国赔款问题是 20、30 年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可以说，一战后战胜国对德国战败赔款的处理不当是导致二战爆发的因素之一。^① 因此，在二战结束后，以美、英、苏为首的战胜国在德国战败处理问题，特别是战败赔偿问题上极为谨慎，三大国既力图避免历史错误的重犯，同时又将各自的利益要求深深根植于赔偿问题的斗争之中，战败赔偿问题遂成为与分区占领德国相伴立的主要内容之一。有学者甚至认为“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分歧是导致盟国在所有关于德国占领问题上无法达成

^① 一战后与二战后德国战败赔偿问题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一战后的德国赔偿主要是战败赔款问题，而二战后的德国赔偿问题则主要是指以实物形式支付的赔偿。

永久性一致意见的主要原因。”^①

一、国外研究状况

目前就笔者所见，关于战后德国战败赔偿问题的最早研究是由欧美（主要指西欧和美国）学者完成的。从时间上看，从战后初期40、50年代到90年代与此问题相关的研究专著（包括博士论文）一直层出不穷。^②

^① “Germany Partitioned, September 21, 1949 – October 7, 1949.” Discovering World History. Gale Research, 1997. Reproduced in History Resource Center. Farmington Hills, MI: Gale Group. <http://galenet.galegroup.com/servlet/History/>

^② 50年代的主要著作有：Vladimir Alexandrov, *Soviet Dismantling of Equipment in Post-war Germany*, Slusser 1953; Michael Balfour and John Mair, *Four Power Controls in Germany and Austria 1945 – 194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1956; Herbert Feis, *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 the War They Waged and the Peace They Sought*, Princeton 1957; E F Penrose, *Economic Planning for the Peace*, Princeton New Jersey 1953; Robert Slusser, *Soviet Economic Policy in Post-war Germany*, New York 1953; J F Snell, *The Wartime Origins of East-West Dilemma over Germany*, New Orleans 1959; 60年代的主要著作有：Nicholas Balabkins, *Germany Under Direct Controls: Economic Aspects of Industrial Disarmament 1945 – 1946*, New Brunswick 1964; Herbert Feis, *Between War and Peace*, Princeton and Oxford 1960; John Gimbel,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Germany*, Stanford 1968; Manuel Gottlieb, *The German Peace Settlement and the Berlin Crisis*, New York 1960; R D Hughes, *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Germany 1945 to 1948*, Ph. D. thesis, Charemount 1964; 70年代的主要著作有：John Wheeler-Bennett and A. J. Nicholls, *the Semblance of Peace: the Political Settlemen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72; Herbert Feis, *From Trust to Terror: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1945 – 1950*, New York 1970; Robert Geoffrey Webb, *Britain and the Future of Germany: British Planning for German Dismemberment and Reparations 1942 – 1945*, Ph. D thesis, State University at Buffalo 1979; Hans A Schmidt (ed.) *U S Occupation Policy in Germany after World War II*, Lawrence 1978; Bruce Kuklick,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vision of Germany: the Clash with Russia over Reparation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2; John H Backer, *Priming the German Economy: American Occupational Policies 1945 – 1948*, North Carolina 1971; 80和90年代的主要著作有：Philip Baggaley, *Reparations, Security and the Industrial Disarmament of Germany*,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80; Alec Cairncross, *the Price of War, British Policy on Germany Reparations 1941 – 1949*, New York 1986; Carolyn Woods Eisenberg, *Drawing the Line: the American Decision to Divide Germany 1944 – 1949*, Cambridge 1996. etc.

就德国战败赔偿问题的专门研究从 40 年代后期就已开始，主要以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录为准，这可以算做是就赔偿问题的最早研究。这一时期的专著主要有：由对德赔偿政策经济顾问小组成员瑞茨福德和罗斯共同完成的著作《柏林赔偿任务》（B. U. Ratchford & W. D. Ross, *Berlin Reparations Assignment*, Chapel Hill 1947）以及在制订美国对德赔偿政策上起到重大作用的金斯伯格所著的《德国赔偿的未来》（David Ginsburg, *The Future of German Reparations*, Washington 1947）。这些当事人的回忆录虽然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但却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二战末期和战后初期，在这些参与缔造战后和平的政府官员的回忆录和著作中涉及到了这一时期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他们都认为在德国赔偿问题上大国的政策和冲突是极其重要的。负责德国事务的英国内阁成员海德（Hynd）指出：“正是在关于赔偿的原则和分配问题上持续不断的争吵成为阻止为德国和奥地利问题提供一个总的解决方案的主要因素”^①；坎贝尔（John C. Campbell）认为赔偿问题是“具有决定性的事务”^②；莫斯科会议期间任马歇尔的经济顾问的马嵩（E. S Mason）认为盟国在赔偿问题上存在“巨大的、超越其它的差异性”，只有这一问题的解决才可能为其它重要问题的解决提供杠杆和条件^③；金斯伯格认为“赔偿将可能是莫斯科会议前的中心事务”^④；波茨坦会议上任美国代表团顾问的莫斯里（Moseley）认为“赔偿问题早就被认为是盟国合作成败的关键”^⑤；英国对德国问题的怀特文件指出“苏联与其它盟国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德国的经济统一问题，……四大国在德国经济统一上无法达成一致，主要是与苏联在赔偿问题上的要求之间的冲突。”^⑥

①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Nov. 22, 1947, p. 404.

② Campbell,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47–48, New York, 1948, p. 70.

③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I, 1947, p. 438.

④ David Ginsburg, *The Future of German Reparations*, Washington, 1947, p. 48

⑤ Moseley, *Face to Face with Russia*,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Heading Series, no. 70, 1948, p. 9.

⑥ *White Paper, Germany*, no. 2, Oct. 11, 1948, Cmd. 7534, p. 9, 转引自“the Reparations Problem Agai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 16 (1950)。

除当事人的回忆录外，更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性研究应该说是始于 70 年代，从研究内容和研究角度来看主要可归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研究主要是从一国的角度进行的，即分别从美、英两国政府对德政策制订的角度入手。

研究美国方面的主要著作可见布鲁斯·库克里克的《美国的政策与分割德国：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冲突》（Bruce Kuklick,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vision of Germany: the Clash with Russia over Reparation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2）以及卡罗列恩·艾森伯格的专著《划定分界线：美国分割德国的决定 1944—1949》（Carolyn Woods Eisenberg, *Drawing the Line: the American Decision to Divide Germany 1944—1949*, Cambridge 1996），后一本书虽然不是就战败赔偿问题的专著，但是作者也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来论述战败赔偿问题。

库克里克可以被认为是专门地、较系统地研究美苏在战败赔偿问题上冲突的第一人，在此之前的研究一方面是如前所述的当事人的回忆录，另一方面则是内容较为庞杂的论文^①，因此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库克里克在书中主要考察和研究的是美国国务院多边主义外交思想^②在对德政策中的运用。作者分析了从 1939 年到 1944 年国务院制订对德政策的过程

^① 论文所涉及的范围较广，有关于分割和肢解德国的，如：William M Franklin, “Zonal Boundaries and Access to Berlin”, *World Politics*, 16 (1963—1964); Frederick H. Gareau, “Morgenthau Plan for Industrial Disarmament in Germany”,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4 (1961); 有关于德国经济恢复的，如 Manuel Gottlieb, “The German Economic Potential,” *Social Research*, 17 (1950); 有关于租借法案的，如 George C. Herring, “Lend-Lease to Russ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4—1945,”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56 (1969); The Abortive American Loan to Russ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3—1946, *Jorunal of American History*, 56 (1969) 等。关于赔偿问题的论文 “The Reparations Problem Agai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 16 (1950)] 更多的是从一种回忆的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的。

^② 所谓多边主义外交思想，作者界定为“即美国人所倡导的一种经济上要求贸易扩张，政治上要求‘自由民主’的理念”，美国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全球经济，要求所有国家降低关税、取消贸易壁垒，所有国家的市场都要对美国物资开放，美国能够在任何地方实现其商业利益。笔者认为，作者所言的多边思想实际上就是强调经济政策对外交的重要影响，认为经济是影响外交政策的根本因素。

中与其它政府机构（主要是财政部、陆军部以及和总统）之间的斗争，最终到 1945 年春确立起国务院对德政策的主导地位。

作者认为，“考察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德政策，必须将其与赔偿问题联系起来，德国问题几乎完全是与赔偿问题相关联的”^①。美国在赔偿问题上坚持强硬的、毫不妥协的立场：禁止苏联从德国西占区获得任何利益，力图在谈判时打消苏联的所有企图，还不切实际地希望苏联接受美国的赔偿方案，减少苏联对东占区的赔偿要求。作者认为，正是国务院所坚持的多边主义理念排除了美国在德国问题上的让步，而且多边主义又是决定雅尔塔会议后美国对赔偿问题的态度的重要因素，因此正是由于美国这种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使得美苏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在研究冷战问题上，库克里克代表了修正学派的观点。从行文中，不难看出作者对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德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它一方面导致了战后美苏的敌对和冲突，另一方面由于它基本没有考虑到战后初期的新的欧洲格局，因此作者认为这一外交政策也是不现实的。

研究英国方面的主要著作可见美国布法罗州立大学罗伯特·韦伯的博士论文《英国与德国的未来：英国在肢解与德国赔偿问题上的计划 1942 – 1945》（Robert Geoffrey Webb, *Britain and the Future of Germany: British Planning for German Dismemberment and Reparations 1942 – 1945*, PhD thesis, State University at Buffalo 1979）以及卡恩克劳斯爵士的《战争的代价：英国对德赔偿政策 1941 – 1949》（Alec Cairncross, *the Price of War, British Policy on Germany Reparations 1941 – 1949*, New York 1986）。

韦伯关于英国对德肢解及赔偿政策的研究打破了长期以来在研究冷战起源问题上基本只以美苏两家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框架，具有一定开创性。作者在论文中也指出“尽管英国是三大盟国中实力最弱的国家，但是在塑造欧洲未来政治图景的过程中她所建议和寻求的政策是重要的”^②。的确，二战后美国放弃了孤立主义传统而插手欧洲事务，这是由美国政治、经济实力膨胀及其全球战略所决定的，而欧洲事务，特别是

^① Bruce Kuklick,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vision of Germany: the Clash with Russia over Reparation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2, p. 2.

^② (microfilm)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Vol. 40 No. 09, p. 5152 – A.

德国问题，不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外交传统来看，首先应该是英、法这样的欧洲大国所倍加关注的问题。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韦伯在论文中主要从研究英国外交部对德计划的演变入手，考察了战时英国在肢解德国以及德国赔偿问题上的政策和态度，主要针对与苏联之间的矛盾，英国提出苏联不能同时要求德国非工业化与支付赔偿。作者认为战后导致欧洲分裂的直接原因正是由于战时盟国在对德和东欧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所导致的。

80年代，古稀之年的卡恩克劳斯爵士继续这一问题的研究，所不同的是，一方面，他集中于英国对德战败赔偿政策这一个问题的专门研究；另一方面，他研究了包括英国内阁、外交部等更广泛的政策来源范围。卡恩克劳斯爵士本人就曾是负责准备英国对德政策计划的经济顾问小组的组长，作为制订德国赔偿政策的亲历人之一，他没有以回忆录的形式在事后立即记录下所经历的一切，而是在事隔几十年后以一个学者和当事人的双重身份来研究这一问题，这使他的研究著作颇具特色：史实条理清晰，作者的主观评论较少。他在其论著中就英国对德战败赔偿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研究，探讨了从战时到40年代末英国政府在制订对德战败赔偿政策过程中的争论以及不同时期的政策发展和演变。

上述两部著作的相同之处在于，主要探讨的都是英苏之间的矛盾，而对于美英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基本没有涉及。

第二类研究则主要是从多角度进行的。可见美国耶鲁大学的菲利普·白格雷的博士论文《赔偿、安全与德国的非工业化：波茨坦决议的起源》^①，作者认为，美英苏三大盟国在1944至1945年间所采取的外交行动源自各自不同的对德经济政策（对德战败赔偿是其主要内容之一），而非源自东西方关系的恶化；同时，盟国间关于德国经济问题的争论有助于冷战格局的出现，但并非直接导致对峙这一结果本身。^②

作者仍然以美国的角度进行研究为主，但同时更多地兼顾了三大国之间的争论。作者认为二战后期美英所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使苏联

^① Philip Baggaley, *Reparations, Security and the Industrial Disarmament of Germany: Origins of the Potsdam Decisions*,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80.

^② (microfilm)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Vol. 41 No. 05, p. 2241 - A.

与西方大国分裂，而是在这一时期经济政策上产生的矛盾：即应该强调对德战败赔偿还是对德实行非工业化。作者认为 1944 年 8 月“摩根索计划”的提出对此产生了重要影响。摩根索要求德国“彻底非工业化”的思想虽然没有被完全接受，但是它却影响到美英苏三大国对德外交政策的走向，作者认为，在美国，它使得“非工业化比赔偿更重要”的观点占据上风；在英国，它使丘吉尔对此的想法产生重要转变；在苏联，斯大林在此情况下则认为西方将会接受对战败国非工业化的决定。同样，美国在雅尔塔会议和 1945 年 6 月莫斯科赔偿会议上对苏联的建议的反应完全不同于英国对此的反应，其部分原因也归因于摩根索计划的影响。

作者指出德国战败赔偿问题是 1945 年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争论最大的问题之一。苏联因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而希望获得大笔赔偿，同时也希望削弱德国再次发动战争的潜力，英美虽然同意这一基本原则，但是却担心苏联的计划会使德国依赖于西方的救援，导致美英的投资事实上成为支付给苏联的赔偿。而在赔偿原则的制订上，作者认为“分区赔偿”原则的确定预示了并且有助于德国日后的分裂，虽然该原则是由美国提出的，但究其根源还在于苏联。作者认为由于苏联在未经西方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在东占区采取了大规模的拆迁，而美国以此作为苏联不愿加入共同的对德经济政策的标志，因此美国提出分区计划则成为一种必然，英苏最终也不得不接受美国的计划。显然作者的这一观点是无法令人信服的，美国提出分区赔偿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担心由于苏联要求大量赔偿，从而使得多边主义的目标难以实现。

就笔者所见，苏联及东欧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可散见于其外交人员的公开言论或回忆录中。主要有：莫洛托夫（Molotov）的《苏联外交政策》，上海国际出版社 1946；麦斯基（Maisky）的《一个苏联大使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Soviet Ambassador, London 1967）；吉拉斯（Djilas）的《同斯大林的谈话》，司徒协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等；其次在苏联外交政策史的著作中也有零星论述，主要有：伊瓦辛（ИВАШИН, И.）等编写的《国际关系与苏联外交政策研究提纲》，何理良译，解放社 1949 年；维辛斯基（А. Я. Вышинский）等撰写

的《苏联外交简史》，雉堞译，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葛罗米柯（Громыко, А. А.）的《永志不忘：葛罗米柯回忆录》，伊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等，这些论著均强调苏联获取赔偿是出于补偿战时巨大损失所必需的。

二、国内研究状况

就笔者有限的资料查询，关于德国战败赔偿问题的研究，国内目前尚无专著出版，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可散见于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的教材及相关著作中。国际关系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刘同舜、姚椿龄主编的《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方连庆等主编的《战后国际关系史 1945—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王绳祖主编的《国际关系史》，第七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等，这些著作都涉及到了美英苏三大国的对德国战败处理政策。由于上述著作主要是作为通史教材出版的，因此论述的大多是一个宏观框架，而且在对德政策上主要探讨的是从战时分割德国，到战后对德实行占领政策的转变，并没有就赔偿问题做专门论述，因此该问题仍有待做进一步、专门化的、具体的研究。

在外交史的著作中，主要包括：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1989》，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资中筠主编的《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陈乐民等编著的《战后英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韩正文等编译的《苏联对外政策史》，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等。这些著作都分别从美英苏三国外交政策的角度宏观地论述了各大国不同时期的外交政策和战略，其中也涉及到战后初期三大国的总的外交方针。

其次，随着 1991 年两德的统一，以及针对 90 年代后期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在此国际背景下，对德国问题的研究又掀起热潮，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围绕德国统一的历史以及对比德日两国对二战的不同态度为主题的研究成果。

在这些著作中，有的着重论述德国从战后被盟国占领状态到冷战时

期的德国，直至两德重新统一的历史^①。在萧汉森和黄正柏主编的《德国的分裂、统一与国际关系》一书中，作者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自近代德国统一运动以来，德国处于分裂状态和统一时期与世界，特别是与欧洲主要国家的相互影响，认为德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往往制约着、影响着或者受制于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斗争和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事实上，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受制于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斗争和国际格局”主要是针对战后德国的情况而言的，可以说战后美苏两国是对两德影响最大的国家。

还有的著作从比较德日两国对二战反省态度的差异入手，分析其产生的根源^②。彭玉龙在《谢罪与翻案：德国和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罪行反省的差异及其根源》一书中指出，盟国对德日法西斯罪行清算程度的不同是导致两者态度不同的原因之一。作者认为与对日相比，盟国对德较彻底地清算了纳粹的根源，作者专门论述了美国在战后初期对德政策的转变，从国家安全委员会 1067 号决议到 1779 号决议的转变，以及纽伦堡审判、德国宪法的制订等内容。上述著作都涉及美国对德政策，但主要是将其作为背景情况来交代的，而不是做专题研究。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张盛发的新著《斯大林与冷战》是一部依据新解密的档案文献探讨苏联与冷战起源的关系的著作。作者在这部著作中指出：“德国问题在苏联与西方盟国之间是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问题”，“在德国赔偿问题上，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分歧同样很大”，“波茨坦会议确定的分区占领原则，……使每个大国对德国的要求更加相互矛盾和不可协调”^③。由于这部著作主要从宏观的角度考察斯大林体制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而不是就

^①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写的《德国统一纵横》，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版；晏小宝主编：《德国的统一》，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2 年版；萧汉森，黄正柏主编：《德国的分裂、统一与国际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吴友法：《当代德国：命运多舛的世界新秀》，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彭玉龙：《谢罪与翻案：德国和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罪行反省的差异及其根源》，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1 年版。

^③ 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70、172、173 页。

其中的某一个子问题进行研究，因此在对德战败处理，以及对德赔偿政策方面作者着墨不多，而且作者主要是从苏联的角度来研究的，对美英两国的政策也涉及不多。

在学术论文方面，相关研究首先可见于探讨对德分割及占领政策的专题中。^①

金重远在论文中主要论述了二战期间美英苏三大国在分割德国和德国赔偿问题上的立场和策略，并分析了三大国的得失，作者认为在分割德国问题上是美英提出方案，苏联发表意见；苏联在这一问题上只是“洗耳恭听”，并不时加以评论，苏联既避免了把分割德国的责任推到自己身上，又在分区占领德国中获得了应得利益，“一箭双雕”；而在德国赔偿问题上又是按苏联提出的原则解决的，因此作者认为苏联在对德战败处理问题上占据优势。

吴伟在论文中认为冷战时期东西欧两大国家集团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但四大国围绕处理战败国德国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最为重要，作者着重分析了苏联与西方盟国在制定和实施分区占领德国方案上的合作与斗争，并说明在这个过程中是怎样孕育了最终导致德国分裂及促成东西欧国家集团的种子。

吴友法在论文中分析了美英苏三大国对德国战败处理的政策，认为三国在二战尚未结束时主张分割德国，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他们放弃了分割德国的计划，转而同意由四国占领德国，由于美苏冷战的爆发，使德国的分区占领格局最终演变成德国的分裂局面。

郭尚鑫在论文中主要探讨了战后初期美国对德政策的演变，认为二战晚期和战后初期美国由于国内因素和国际关系诸原因，对战后德国的处置经历了从分割到占领并演变为重建的过程，这与美国一贯注重实际利益的外交原则相吻合。

^① 林勇军：《美国的对德政策和德国的分裂》，《世界历史》1983年第5期；金重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问题》，《复旦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吴伟：《苏联与西方盟国在划分德国占领区问题上的合作与斗争》，《东欧中亚研究》1994年第2期；郭尚鑫：《论美国对战后德国的处置》，《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8期；吴友法：《战后美苏‘冷战’与德国的分裂》，《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